學而不思則罔

——再論治學方法與文學批評

鄭振寰

一、引言

數月前我在「從治學方法看文學批評」①一文提出死讀書而不求甚解並不足以養成學問，以夏志清的文學批評論著爲實例，檢討他所提倡那種重背書輕思想的治學方法，怎樣引致了見解幼稚偏見充斥的論調。

其後黃維樑發表「大批評家必須博學」②爲夏志清辯護，指出讀書多才能作多方面的比較，夏志清的書讀得多，所以「鄭振寰那類充滿偏見的論調，怎能服人呢？大批評家必須博學。他連這個道理也把握不到，其他還有什麼可說的？」②

這裏我可先指出：第一、我從沒有說過或暗示過批評家不必博學，我的論點是單靠讀書多並不足以成爲大批評家，更重要的是要能眞正瞭解作品，就像批評家必須識字，但單識字，並不足以成爲批評家一樣，黃維樑若非不明白這顯淺的分別，就是故意歪曲我

的論點。第二，我從沒有否認夏志清書讀得多，事實上我還說他「典故記得多」，「收集得很多資料」①，我批評的是夏氏學而不思，讀而不化，以致其論調膚淺空疏。黃文大部份篇幅在討論我所不爭議的批評家必須博學、夏氏讀書多兩點，但並沒有答覆我學而不思的批評。第三、黃維樑對我「治學方法」裏所提出的論據和例證，完全避而不答，只是用夏志清的「權威」來證明我批評夏志清是不對的。

學而不思則罔，不要讀死書，要用思想，瞭解書本內容，這是小學生都熟知的了，但它也許已成爲老生常談，很少再有人提到它的眞正重要性了，好像夏志清以思想理性爲敵人，如黃維樑以權威爲圭臬等，都不是今天學術界的好現象。本文引夏志清的文學批評爲例，再論治學的方法和效果，並兼答黃維樑。黃維樑「大批評家」②一文的內容，多有重覆他早些時的長文「文學博士夏志清」③，本文亦將選引此文有關的地方加以分析。很多夏志清的言論，如提倡背書、輕蔑思想、推崇信條，貶斥理性等，我在「治學方法」一文中經已引證指斥，（這些指斥及其論據是黃維樑所沒有亦不能爭議的），如非必要，本文不再覆述。

二、毫無論據支持的武斷

在「治學方法」一文中，我引夏志清的話：「在美國教詩，我常對學生說，中國詩人大多數想做高官，……讀他們的詩篇，簡直很難發生同感」，和他批評「薔薇謝後作」說不值得這樣哀悼幾朵花兒（原引很長），解釋他如何泥於字面意義，完全接觸不到詩詞的深意，由此可見其文學感性非常薄弱。黃維樑辯解道：「夏氏這些說法，是他一時的『偏見』，是『思想放假』（錢鍾書語）期間情緒的逍遙遊。對夏志清有偏見的人如鄭振寰，自然可以捉住這些『偏見』，大寫文章攻擊他，說他『文學感性非常薄弱』。」②

請注意即使黃維樑也不得不承認夏志清對古典詩詞的看法是「偏見」，是「思想放假」。但夏志清以一個研究文學的人，如非對詩詞毫不瞭解，再不經大腦也發不出這種謬論。從其論調看，夏志清不明詩詞是事實，他文學感性薄弱也由此可見，「思想放假」算是什麼理由？討論學術，必須實事求是，夏志清錯

了就錯了，爲什麼要用「逍遙遊」的讚語來掩飾美化他的錯誤？爲什麼別人指出就是基於「偏見」的攻擊」？最後但最重要的，夏志清的謬論並不是如黃維樑所謂「某時某地的某些感情」②，而是他教書時「常對學生說」的話。他不明詩詞却自以爲通，大言不慚，從教育上看是誤人子弟，從文化上看是糟蹋中國文化的瑰寶，批評這些謬論是稍有學術良知的中國人都不會反對的。

黃維樑道：「鄭振鐸說夏志清的『論點多浮誇空洞之言，禁不得深思』，眞不知他何所據而云。夏氏的『中國現代小說史』，成一家之言，這是早有定評的。」②我在「治學方法」中緊接着「禁不得深思」後，馬上舉出論據，如夏志清說「紅樓夢」等三大巨著的主題都是「人生如夢」的論點作例證，解釋它們怎樣空疏，爲什麼禁不得深思，黃維樑對這些理由和例證視而不見，却說我「眞不知何所據而云」，實在不知他是怎樣讀文章的。

黃維樑舉夏氏「中國現代小說史」作例來證明夏氏論點並非浮誇空洞。我在「治學方法」第三節即駁斥「小說史」最主要的結論之一，即現代中國文學膚淺的原因在其不認識「原罪」說。我從歷史、文學本質、原罪的意義等多方面舉出理由，並引西方文學三大黃金時代的作品爲實例，解釋夏志清的結論如何非但浮誇，而且根本錯誤。黃維樑對「治學方法」第三節的討論完全避而不談，不論他是表示默許還是無話可說，但既有他不能反駁的實證，他還以「早有定評」來壓人，豈非不講道理只講權威？

黃維樑力讚夏志清有學問有見識，「找不到什麼人可以和他媲美」②③，並「自信這是相當客觀公允的評價。」②要客觀地討論問題，起碼得針對駁倒相反意見的論據才成，假如漠視論據，不講理由，强行宣稱自己是「公允」對方是「偏見」，那麼所謂「自信」不過是盲目的武斷罷了。

這一節我指出黃維樑不能面對我的論據，下三節檢討他持以大讚夏志清的理由。

三、眞學問與假「學問」

黃維樑稱「夏志清的文章，每一篇都密密麻麻地充滿着學問」③，到底他所謂「學問」是指什麼呢？黃維樑舉出幾個例子，典型如下：「夏氏說：『僅以

短篇小說而論，她（張愛玲）的成就堪與英美現代女文豪如曼珠菲兒、泡特、韋爾蒂、麥克勒斯之流相比，有些地方，她恐怕還要高明一籌。』這裏短短一兩句話，已經蘊藏了批評家多少學問！」③據黃維樑說這種比較能「使讀者眼界大開」②。然則讀者究竟在這空疏不切實的比較中看到了什麼呢？除了一大堆名字之外，什麼內容也沒有。何以見得這些作家的成就相若？夏氏在他的文章裏說不出；張愛玲什麼地方比較高明？夏氏也說不出。這等口說無憑的比較有何意義？我們怎知這不是夏氏個人的偏見武斷？又例如黃維樑舉夏志清對中西詩詞的比較③，但如我所指出，夏氏根本觸摸不到中國古詩的精粹，他的比較到底有何價值？

漢姆雷特拿着本書，別人問他在讀什麼，他答道：「字、字、字、」——那時他正在裝瘋。現在有人寫論文不外拋名字、名字、名字，黃維樑大讚「蘊藏了多少學問！」，但他是清醒的。拋名字就算「學問」？那麼要有「學問」眞太容易了。隨便什麼人，只要到圖書館找一兩本「人名錄」、「文學辭典」之類的書，不花兩小時便可以搬出百十個名字，空口評這個比那個了。譬如我隨手寫寫：「七等生的小說裏隱約可以見到卡夫加和卡繆的影子，有些地方也與托馬思曼有些相似，包蘊着一股類似『保華利夫人』、『紅與黑』、『地下室手記』裏所表現的叛逆性，我們還可以把他最好的小說與亨利詹士的『一個藝術家的少年畫像』的某些片段比較……。」黃維樑佩不佩服我的「學問」？有沒有眼界大開？若沒有的話，請他解釋爲什麼夏志清拋名字就是「學問」，而我拋就不是。

黃維樑大概會說，夏志清是眞的讀過作品才比較的，但從文章上看，大家都是除了名字之外什麼也沒有說，何以見得夏志清讀過而我未讀過？他瞭解作品而我不瞭解？黃維樑又可以說，夏氏是知名的學者，是權威，所以他的話靠得住，但這除了以權威壓人之外，他又怎知權威不是在「思想放假」？黃維樑還可以說，夏氏評得對我評得不對，但這樣他就必須確實地指出爲什麼夏氏評得對我評得不對，這就接觸到我們要討論的問題的癥結所在了。

我們做學問，不能只有意見，更重要的是要知道我們的意見有何理由憑據。意見多並不算是學問，

眞正的學問工夫在能知道自己的意見有多少憑據，是不是有充份的理由。同樣，在做文學批評或比較時，單只搬出一大堆作品名號，空口說這好那差，並不能算是眞學問，眞正的學問工夫在能實在地指出何以這作品好，好在什麼地方，從何見得這作品比那作品好。要做到這些就得充份瞭解作品，瞭解各種「好」的內容涵義，單是讀過作品而不瞭解，或不能把握到人生問題的複雜微妙，是做不到出色的文學批評的。

大批評家必須多讀書，這話不錯，但多讀書只是必須條件而不是足够條件。能讀通十本書當然比讀通一本書好，但如果讀過十本書而不瞭解它們，那就不如眞正讀通一本書了。最可怕的是讀過很多書而不甚了了的人，以爲讀過就是通識，把自己的幼稚見識當作書本所涵的智慧，强充權威，阻碍學術。夏志清讀過很多書，但由於他只注重背記而視思想理性爲絆脚石，所以他不能把握書本的內容涵義。他擅於敍述小說的故事大綱，但若作品表現出稍爲深微複雜的人生問題，他就完全掌握不到了，所以只能靠拋名詞來搪塞，或作老生常談，沒有精闢之見。關於這一點我在前文「治學方法」及下一節舉出了不少實例說明，這就是前文所謂的見解「尋常」、「淺近空疏」、「禁不得深思」。黃維樑把「尋常」解作不標奇立異，不裝腔作勢②，是曲解了我的意思。

四、套框框的文學批評

有人從字典中得知馬是一種頭小面長，體態矯健的四足動物，出外見到雄鹿便以爲是馬，我們可以說此人不明白馬是什麼。同樣，假如有人記得一大堆名詞，也模模糊糊知道一點它們的意義，但却把它們用在不適合或錯誤的地方，我們便知道他其實並沒有眞正掌握到這些名詞的內容。古人所謂典故記得多容易，用典用得貼才考眞工夫，就是這個意思。記典故只要讀死書就成了，但用典用得貼，非但得眞正瞭解此典，更要瞭解它所應用於那件事物才成，眞學問與假「學問」的分別，在這一點上就顯出來了。沒有眞學問的人，往往只能把名詞典故當框框，亂套硬塞，雖然或可以嚇嚇不深思細讀的人，但終不免爲有識者笑。

夏志清的論著中常說及作品中的「儒」、「道」、「佛」思想，依黃維樑說來，這是「從大處下筆」

③。其實從他的論調上看，夏志清對儒釋道三家思想的認識淺薄得叫人吃驚。例如他在「文人小說家和中國文化」一文中，就多次表示「道家之道」不外「離世登仙」，有時甚至混淆了道家與講符咒風水的道教。又例如他在「新小說的提倡者：嚴復與梁啓超」中，就因梁啓超推崇大乘佛學貶斥通俗拜佛的迷信而大做文章，說是梁氏的「矛盾」，可見他連大乘佛學與拜佛迷信有絕大分別也不清楚，只因二者都沾上個「佛」字就往同一個框框中套。

在「文人小說家和中國文化」裏，夏志清反覆討論的所謂「儒家德目」、「儒家道德」不外是「忠孝節義」，不知他把儒家三達德「智仁勇」放到那裏去了。這還罷了，糟糕的是他連「忠孝節義」到底是什麼也把握不住。譬如在這篇三萬餘言專論「鏡花緣」的文章中，他力稱女主角唐閨臣是「孝女」，說她「把儒家忠孝之道盡了。」唐閨臣第一次出海尋父之舉的確表現出孝心，但她後來雖然明知父親已得道成仙，不需人奉侍了，却仍跟着出海修仙，撇下老母在堂臨風灑淚倚門長望，絕不眷顧，連她自己都知是「缺了孝道」（「鏡花緣」九十四回），很難明白夏志清怎會力稱她「盡了孝道」。

再舉一例看看夏志清對人性和道德問題的認識。他在「文學雜談」一文裏說：「當年讀（威爾遜的）『到芬蘭車站去』，讀到列寧的早年生涯，的確很被感動，哥哥被沙皇政府絞殺後，才抱了決心去搞革命。後來讀了別的書籍才知道列寧手足之情，並沒有這樣深摯，威爾遜一心要把列寧寫成英雄，把他的人格寫得太理想化了。」對夏氏來說，「手足情深」是一個好框框，套得進去就是理想化人格。但他不知革命是涉及很多人幸福，使很多人流血的大事，把兄弟私情作爲搞革命的決定性因素，實在是公義私仇不分，非但不算是「理想人格」，簡直可說是不道德。

道德問題是很微妙複雜的，常要經過深入的分析思考才能掌握瞭解它們，就如「忠孝」等極普通的問題也不簡單，所以有人會「愚忠」，就是因爲他們把握不到「忠」的眞正意義、眞正內容。文學的偉大就在它能使人們實在地看到各種人生問題的複雜性，看到一些我們以爲是老生常談的教條如「忠孝」等原來包含着多麼豐富深微的涵義，而這些都是夏志清所看不見的。以上兩個例子從另一方面輔證了我在「治學

方法」提出的批評，那就是，由於夏志清輕蔑思想和理性，只是崇尚信條，所以即使文學作品如希臘悲劇等表現出深微的道德和人生問題，在他眼中也變成了教條式的「老玩意兒」，他這種套框框的批評實在荼毒了文學。

綜觀夏志清的論著，還可以發現幾個大框框，很多時他就用框框來定批評標準，如「反共」、「感時憂國」等。前者已有很多人討論過了，這裏略論一下後者。就用黃維樑「大批評家」裏舉的例子吧，他舉夏氏指出當代作者如白先勇等人的作品「充滿了感時憂國的精神」。這他沒有說錯，夏氏在「白先勇早期的短篇小說」、「懷國與鄉愁的延續」兩篇論文裏確是力讚白先勇的小說「滿是憂時傷國之情」，「表現了坦然愛國的立場」。我大概是第一百個提出反對的人了：白先勇的著名小說如「臺北人」諸篇深深懷念的，是在路有凍死骨的歲月中那些朱門酒肉臭的奢華，如果說亡國喪家，那麼這種腐化的生活排場正是原因之一，白先勇不痛定思痛，只對昔日奢華惋惜不已，他愛的是什麼「國」？憂的是什麼「時」？夏志清大概覺得「愛國」是一個好框框，而他認爲白先勇的小說好，就不分青紅皂白硬把它們往好框框裏塞，有時甚至不惜揑造或扭曲小說的內容，例如他說「芝加哥之死」的主角吳漢魂「努力探索自己的一生，他忘不了祖國」，其實吳漢魂唯一的人生目標就是個博士學位，從不理會自己的生命意義，正是個典型的行屍走肉，整篇小說裏找不到一絲他懷念國家的影兒，假如夏志清不是隨口亂說，請他從小說中舉出吳漢魂探索人生不忘祖國的地方吧。大概他唯一可舉的就是「漢魂」這名字的「象徵性」了，可惜連這不是理由的理由也不能成立——漢魂姓吳——吳（無）漢魂。

在這裏我必須補充，夏志清在理論上是反對套框的文學批評方法的，他在很多地方都有提及，而且他也常批評別人套框框。一個人的理論和實踐不符是很常見的現象，很多時原因就在他不能完全瞭解掌握自己理論的內容。我相信夏志清並不知道自己在實踐上其實也和別人一樣套框框，只不過他所套的框框與他所批評的人不同罷了。我認爲寫批評應着重實踐方面，所以我「治學方法」裏批評夏氏的治學觀點也便基於他自己的實踐。這裏我特別明白指出夏氏的實踐和他關於套框框的理論不符，希望他能反省一下。

五：權威的剖視

「如果夏氏的『論點多浮誇空洞之言』，豈能得人擁護？」②我們面臨黃維樑爲夏志清辯護的最後一道防線了，用一句話說，這防線就是：別忘了夏志清是權威。黃維樑用很多話來重覆這一點，如「其論點得到多人支持」，「這評語不止印在晨鐘版『臺北人』小說集的封底，更爲許多談論白先勇小說的人所引用」，「他的成就，是大家有目共睹的」……②。他又叫我參閱他的「文學博士夏志清」長文，其中更多篇幅形容夏氏是個多麼大的學閥，多有名位，有多少人捧他等，總而言之，他是權威，知道後「對夏志清的批評，應可收斂多少。」②

我不否認在當今臺港海外，夏志清的確相當權威，不過雖然有不少人贊同他的論調，反對的人也一樣多，如鄉土文學派就是，又如夏氏捧姜貴的小說，也沒有多少人附和。不過說這些其實多餘，因爲我們是在討論學術，不是在選美，去數眼前有多少票支持是沒有意義的。我對夏志清的批評基於明顯的理由和論據，若不從理上說，怎樣大的權威也壓不倒我。黃維樑的唯權威論只顯出他理窮罷了，本來是不值一駁的，但鑑於文學批評是一門很「軟」的學科，客觀標準少，所以權威的影響也比較大，因此在這裏解剖一下權威。

若沒有眞材實料，怎樣成爲權威？世上大部份權威確是有點眞材實學的，但這也不是說沒有很多例外。名位、權勢，時運等等都可以造成權威，就像文革時江青的文藝論調威風一時，得到海內外多少知識份子大學者名作家的擁護捧頌甚至膜拜，但這種權威又怎能掩飾她的不學無術？又如夏志清，假如他不是美國名校的教授，他的論調會不會像現在一樣受人注意？

但如果夏志清不是有眞學問，怎能在美國名校得到教授職？首先，夏志清並不能擠入美國大學的文學系，他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的「東亞言語和文化系」，在學術水準上這種「東亞語言系」和正統文學系相去甚遠。而照夏氏自己說：「在美國讀中文系的（博士）學生……眞正讀過的中國文學原著可說少得可憐。……假定他論文寫『西遊記』，辛辛苦苦把『西遊記』精讀了一遍，也同樣沒有時間去讀『三國』『水

滸』『封神演義』的原文了。」（「追念錢鍾書先生」）我們小學畢業程度的中文就可以取中文系博士，可見在美國研究中國文學的水準如何低了。再者夏志清生得早，那時留學生不比現在多，西方人中文差，中國人用英文來研究中國小說的，他可說是佔了頭籌。本來大學聘教授是有審評水準的，但正如夏志清自己在「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譯本序」裏形容一樣，「那時美國除了哥大王際眞外，簡直找不出另外一位教授曾翻譯過現代中國文學作品的，更無人稱得上是權威」，以致審評他「小說史」的人，不是「不諳中文」，便是「外行人」。江中無魚蝦尙能自大，在這種眞空狀態下，得到職位，並不保證有眞學問。昔日蜀中無大將，廖化當先鋒，當然我並不是說廖化的將才一定很差，不過他必須要顯出眞工夫才能服人，光憑先鋒的名號是不够的。

圈子內的人稱夏志清爲「學閥」「學霸」，治學而稱閥稱霸，可謂一大諷刺，不過在學術界制度下，一旦有了終身職位，眞有如佔了一個山頭。年輕一輩求職、升級，甚至發表論文，都得經過審評，靠權威推薦，而在文學批評這樣一個少客觀標準的學科裏，權威的勢力實在非常巨大。照劉紹銘「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譯本引言」形容，「亞洲學會每年的中國文學小組，不過三個，而開放出來讓大家去公平競爭的，有時僅得一個。入選機會之微，可想而知」，而「凡是他（夏志清）主持的小組，組員要不是他的學生，就是他的晚輩」，最低限度也「與他通過信」，簡直近乎封建時代遞門生帖的風氣了。

權威很多時繫於名氣，而現代人都知道宣傳對於揚名多麼重要。黃維樑指出「夏氏近年來寫文章的一個特色，就是於評論中兼述自己的生活」③。這話不錯，夏氏爲文多有宣傳自己讀過多少書，自己的論調多麼受人擁護，甚或某某人在酒會中讚了自己一句什麼等等，這是黃維樑所謂「自傳式的抒情論文」③。小圈子內互相標榜，也是宣傳的一種手法，如權威讚青年後起之秀，青年捧權威天下無雙，這是一個人盡皆知的現象了。當然我絕非說凡是稱讚別人的文章就是互相標榜，主要的是看這些文章能否切實地揭示出其優點，抑或只是空洞而不切實的吹捧。就說黃維樑的長文「文學博士夏志清」吧，夏氏引用杜斯妥也夫斯基的「白痴」，黃維樑說：「夏志清得的是英語文

學博士學位，而能徵引杜氏這個俄國小說家的作品，我們怎能不承認他的兼通？」③其實像「白痴」這本通行的小說名著，便是大一理科學生讀過也毫不出奇，報章雜文中也不時見人徵引，一個專事研究小說的人引用，也值得喝彩不迭？這種過份得迹近肉麻的讚美，在黃文中觸目皆是，試問這種捧場文字，即使再多一點，除了表現出文化界一種不健康的風氣外，又能說明些什麼？

學閥制度在歐洲有很久的歷史了，但當年不可一世的學閥們，其學說至今尚存的有多少？我堅信只有眞學問才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，沒有眞學問作後盾的虛譽，終會被時間冲得無影無踪。林肯說得好，你可以長久騙過一些人，也可以暫時蒙蔽所有人，但你不能永遠欺盡天下人。

當我們沒有時間去學會掌握某種學識，但又必須靠它作決策選擇時，我們要依靠權威的意見。但當我們眞正討論學術問題時，無論是眞權威或假權威，我們都不能盲目附和擁護他們，而必須運用自己的獨立思考來審評論據。假如思考後認爲權威的意見是對的，我們會贊成這意見，但這樣一來，贊成的理由就不是權威之言而是客觀的憑據和理智了。假如我們認爲權威說得不對，更不妨理性地加以批評。有眞學問的人是不懼批評和辯論的，因爲他不但知道自己對，同時也知道自己爲什麼對，只有虛譽欺人之徒才會忌人批評。古往今來，理性和思想一向是權威的最大敵人。

附註：

①鄭振宵，「從治學方法看文學批評」，「書評書目」87期（一九八〇年七月）。

②黃維樑，「大批評家必須博學」，「書評書目」88期，（八月）。

③黃維樑，「文學博士夏志清」，「書評書目」83期，（三月）。